

漢語方言見系二等文白讀的幾種類型

張光宇

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暨中國語文學系

摘 要

見系二等文白讀在漢語方言的分佈很廣，大約可分為六種類型：長江沿岸、瀏陽、萬榮、汾西、文榮、廈門。這六型具體而微反映漢語方言發展南北異趣：華北似乎有中原核心與邊緣(或外圍)的差異，華南似乎有長江沿岸與非沿岸的分野。黃河以北與長江以南各有其保守與創新。由於文讀係一波一波擴散，甲方言的白讀在乙方言可能仍為文讀，這或許與文教勢力大小有關。漢語語音史上“顎化”是一個廣續不絕的過程，舊說中的年代斷限往往受韻書束縛，不足採信。

(一)

現代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是歷史上權威或優勢方言進入地域方言後兩種音系互動的沉積。起初，兩音系各有使用場域並行不悖(讀書用的是一套，說話用的是另一套)，淺假而起了交叉滲透(讀書音侵入口語，說話音借入讀書音)，於是產生了“競爭、取代、抵拒、妥協、分工”等一連串的過程。目前一般所說文白異讀的現象(具有語音對應的關係，能區別詞義或詞性)，總括言之，就是經過長期互動之後“妥協、分工”的結果。文白異讀之所以興起，追根究底是因為古代漢語方言音系發展不平衡所致。音系發展的不平衡包括“演變方向”及“演變速度”的差異(張光宇1991)

蘇州方言止攝合口三等見組字如“龜、歸、虧、馗、鬼、櫃、貴”文讀為洪音，白讀為細音：“龜”_ɕkue(文)、_ɕtɕy(白)。見曉組二等“家、蝦、交、教、眼、鹹、甲、江、角、學”文讀為細音，白讀為洪音：“家”_ɕtɕia(文)、_ɕka(白)。

這兩組正好相反的現象反映了文白音系在演變方向上的明顯差異(葉祥苓1988)。換言之，正因為有這樣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才有蘇州的上列文白異讀。蘇州方言的這類例子富於典型性意義，不僅可用來說明廣大吳語區的文白讀現象(例如浙江吳語區內“龜”類字白讀幾乎都與蘇州 tɕy 相同或相近，參看傅國通等1985)，也可用來說明許多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儘管變化的字類不同，道理是一樣的。

在林林總總的漢語方言文白異讀現象當中，見系二等文白異讀的分佈面積最廣。所謂分佈面積兼指地理上的分佈和轄字範圍。混言之，見系包括“見、溪、曉、匣、疑”諸母；析言之，有的方言見系二等文白異讀在“曉、匣”兩母字一類上表現比較突出，有的方言在“見、溪”兩母字類上彰明較著。爲了行文方便，細節無法詳細區分，統以“見系”概括。漢語方言見系二等文白異讀的差異在相當大的比例上是同演變方向內的速度或階段的問題。其中含有不少對漢語方言發展史的重要啓示。

1. 長江沿岸型：這一類型的特色是“文細白洪”，主要分佈在華中長江沿岸一帶的大埠。這裏舉蘇州、揚州、武漢、長沙四處的方言爲例。

蘇州	家	蝦	交	教	間	減	江	角	降
文讀	tɕia ₅₅	ɕia ₅₅	tɕiæ ₅₅	tɕiæ ₅₁₃	tɕi ₅₅	tɕi ₅₁	tɕiã ₅₅	tɕioʔ ₅	tɕiã ₅₁
白讀	ka ₅₅	ho ₅₅	kæ ₅₅	kæ ₅₁₃	kE ₅₅	kE ₅₁	kã ₅₅	koʔ ₅	kã ₅₁
揚州	家	下	蝦	解	疥	街	教	敲	覓
文讀	tɕia ₂₁	ɕia ₅₅	ɕia ₃₅	tɕiɛ ₄₂	tɕiɛ ₅₅	tɕiɛ ₂₁	tɕio ₂₁	tɕ'io ₂₁	ɕiã ₅₅
白讀	ka ₂₁	xa ₅₅	xa ₃₅	kɛ ₄₂	kɛ ₅₅	kɛ ₂₁	ko ₂₁	k'o ₂₁	xã ₅₅
武漢	家	下	角	架	甲	間	閑	揀	
文讀	tɕia ₅₅	ɕia ₃₅	tɕio ₂₁₃	tɕia ₃₅	tɕia ₅₅	tɕien ₅₅	ɕien ₂₁₃	tɕien ₄₂	
白讀	ka ₅₅	xa ₃₅	ko ₂₁₃	ka ₃₅	ka ₅₅	kan ₅₅	xan ₂₁₃	kan ₄₂	
長沙	家	下	蝦	架	嫁	甲	夾	膠	交
文讀	tɕia ₃₃	ɕia ₂₁	ɕia ₃₃	tɕia ₅₅	tɕia ₅₅	tɕia ₂₄	tɕia ₂₄	tɕiau ₃₃	tɕiau ₃₃
白讀	ka ₃₃	xa ₂₁	xa ₃₃	ka ₅₅	ka ₅₅	ka ₂₄	ka ₂₄	kau ₃₃	kau ₃₃

長江沿岸見系二等文白讀的模式呈現相當齊整的局面：文讀是“舌面音聲母+細音韻母”，白讀是“舌根音聲母+洪音韻母”，簡單說來，就是“文細白洪”。江蘇漣水方言(胡士云1989)的見系蟹攝二等文白異讀(先文後白，下同)

如“解 $t\mathfrak{c}\mathfrak{e}_{212}/k\mathfrak{e}_{212}$ ，界 $t\mathfrak{c}\mathfrak{e}_{55}/k\mathfrak{e}_{55}$ ”中，文讀聲母爲舌面前音 ($t\mathfrak{c}-$)，似乎是從早期的舌面音在三合元音之前演變而成： $t\mathfrak{c}i\mathfrak{e}i \rightarrow t\mathfrak{c}\mathfrak{e}$ 。假攝二等“家”字仍爲舌面音 $t\mathfrak{c}ia$ 。湖南洞口黃橋鎮方言（唐作藩1960）的情況大體與長江沿岸型相合：“家 $t\mathfrak{c}a_{44}/ka_{44}$ ，下 $z\mathfrak{a}_{13}/\mathfrak{h}a_{21}$ ，嫁 $t\mathfrak{c}a_{24}/ka_{24}$ ，瞎 $\mathfrak{s}a_{44}/\mathfrak{h}a_{44}$ ，江 $t\mathfrak{c}\mathfrak{a}_{44}/k\mathfrak{a}_{44}$ ，講 $t\mathfrak{c}\mathfrak{a}_{21}/k\mathfrak{a}_{21}$ ，確 $t\mathfrak{c}'\mathfrak{a}_{24}/k'\mathfrak{a}_{24}$ ”。唯一的區別是：長江沿岸型唸舌面聲母的地方，這裡唸舌尖後音聲母。不難設想，這一類舌面後音係從早期一個階段的“舌面音+i-介音”混化而成。“確”字文讀記作 $t\mathfrak{c}'\mathfrak{a}$ ，同音表中却列在 $t\mathfrak{c}'\mathfrak{a}$ 韻下，足以輔助說明其遞遷關係。安徽岳西方言（儲誠志1987）表面上似乎沒有文白異讀現象，然而“家、架、嫁、夾”只唸 ka ，而“加、假、價、傢”只唸 $t\mathfrak{c}ia$ ，劃然分居，實際上也是文白異讀的一種反映：前組字保守白讀壁壘，抵拒文讀侵奪，後組字表示文讀取代成功，擠走了白讀。

2. 湖南瀏陽型：瀏陽位於湖南省東部，東鄰江西銅鼓、萬載、宜春等縣，西接長沙，南靠醴陵，北近平江。緯度與長沙相若，距長江也不遠，但境內多山，方言情況複雜，有“東鄉話、西鄉話、北鄉話、客姓話（客家話）”等不同口音。“瀏陽話”分布於中部瀏陽城關與南鄉的大瑤鎮，以及文家市部分地方。瀏陽型見系二等文白異讀與長江沿岸型稍有不同。（夏劍欽1983）

瀏陽	家	袈	架	嫁	夾	挾	教	隔	客
文讀	kia_{33}	kia_{33}	kia_{11}	kia_{11}	kia_{44}	kia_{44}	$kiau_{11}$	kie_{44}	$k'ie_{44}$
白讀	ka_{33}	ka_{33}	ka_{11}	ka_{11}	ka_{44}	ka_{44}	kau_{11}	ka_{44}	$k'a_{44}$

雖然，瀏陽型的這類文白異讀不出“文細白洪”的模式，但是文讀聲母仍爲舌根音，並未舌面化。文讀舌面化聲母只見於“曉、匣”兩母字，如“蝦 $\mathfrak{c}ia_{33}/xa_{33}$ ，下 $\mathfrak{c}ia_{11}/xa_{11}$ ，學 $\mathfrak{c}io_{44}/xo_{44}$ ，孝 $\mathfrak{c}iau_{11}/xau_{11}$ ”。就整個瀏陽方言音系來說， $\mathfrak{c} \sim x$ 成互補分配的狀態；在齊齒呼諸韻母前唸舌面音 ($t\mathfrak{c}-, t\mathfrak{c}'-$) 的是在精組字，唸舌根音 (k, k') 的是在見組字。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瀏陽話聲調系統中“平調”特多，曲折調只有一個：陰平33，陽平55，上聲24，去聲11，入聲44。入聲部分只以聲調爲區別特徵，並無塞音尾，跟整個湘方言的趨勢並無二致。

3. 山西萬榮型：萬榮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其方言屬於中原官話汾河片。萬榮方言見系二等文白異讀頗具特色。就其主要傾向來說，文讀一般是“舌面音+細音”，白讀一般是“舌尖後音+洪音”。（吳建生1984）

萬榮	家	嫁	夾	甲	膠	巧	間	繭	角
文讀	tɕia ₅₁	tɕia ₃₃	tɕia ₅₁	tɕia ₅₁	tɕiau ₅₁	tɕ'iau ₅₅	tɕiã ₅₁	tɕiã ₅₁	tɕio ₅₁
白讀	tɕa ₅₁	tɕa ₃₃	tɕa ₅₁	tɕau ₅₁	tɕau ₅₅	tɕã ₅₁	tɕã ₅₁	tɕã ₅₁	tɕo ₅₁

從整體看，這種文白分野並不限於見系二等，也有三四等字合於這個模式，例如“緊 tɕiei₅₅/tɕei₅₅，澆 tɕiau₅₁/tɕau₅₁，叫 tɕiau₃₃/tɕau₃₃，見 tɕiã₃₃/tɕã₃₃”。在二等字當中，古“曉、匣”母的文白異讀獨樹一幟，不與上列“見、溪”母字一致，而跟“長江沿岸型”平行。例如“匣 tɕia₂₄/xa₂₄，學 tɕio₂₄/xo₂₄，鞋 tɕiE₂₄/xai₂₄，蟹 tɕiE₃₃/xai₃₃，孝 tɕiau₃₃/xau₃₃，閑 tɕiã₂₄/xã₂₄，巷項 tɕiaŋ₃₃/xaŋ₃₃”。此外，還有“解 tɕiE₅₅/tɕai₅₅，客 K'E/tɕ'iE₅₁”兩例比較特殊，推測起來，“解”的白讀前身可能是 tɕai；而“客”的白讀和梗攝字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例如二等的“硬、額”白讀是 iE₃₃，三等“明名”的白讀是 miE₂₄，四等“釘、聽”的白讀是 tiE₅₁、t'iE₅₁。回頭看前面所列文白讀表，我們清楚看到，在萬榮方言見系二等文白異讀的區劃中，白讀“舌尖後音+洪音”與湖南洞口縣黃橋鎮同類字的文讀相當。這是漢語方言發展中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

4. 山西汾西型：汾西位於山西南部汾水之西，東與晉中方言相鄰，其方言屬於中原官話汾河片平陽小片。汾西方言見系二等的文白異讀特色主要體現在白讀的舌尖塞音，文讀則與長江沿岸型一致是個舌面音。（喬全生1990）

汾西	家	夾	甲	交	巧	覺	角	間	揀
文讀	tɕia ₁₁	tɕia ₁₁	tɕia ₁₁	tɕiao ₁₁	tɕ'iao ₃₃	tɕiu ₅₅	tɕiu ₁₁	tɕiã ₁₁	tɕiã ₃₃
白讀	tia ₁₁	tia ₁₁	tia ₁₁	tiao ₁₁	t'iao ₃₃	tiu ₅₅	tiu ₁₁	tiã ₁₁	tiã ₃₃

白讀聲母 t- 所轄的字不僅限於二等韻，也不僅限於在細音-i 前頭才出現。例如“雞 tɕ₁₁，繼 tɕ₅₅，啓棄 tɕ₃₃”和“轎 t'iao₅₃，見 tiã₅₅，緊 tiəŋ₃₃”都非二等見系字。這類現象必須連繫汾西方言韻母系統中元音的高化趨勢合而並觀才能夠獲得明晰的理解。汾西方言的韻母系統中除了具有常見的舌尖元音 l 之外，高元音組還有 -i、-u、-y、-ɪ、-ii、ui、-yɪ、-u、-iu 九個，聲化韻三個：-ɕ、-β、-ɣ。元音的極度高化可以說是汾西方言韻母系統的突出特點（從比較的觀點言之，汾西的三個聲化韻都來自高元音，大致的情況是：-i → -ɕ，-u → -β，-y）。古“曉、匣”兩母字的文白異讀，汾西方言和長江沿岸型是一致的，例如“瞎 tɕia₁₁/xa₁₁，匣 tɕia₃₅/xa₃₅，狹 tɕia₃₅/xa₃₅，下夏 tɕia₅₃/xa₅₃”。這類字的白讀聲母是比較保守的。

山西境內，與汾西型見系二等文白異讀大體相同的還有洪洞方言。洪洞方言也是汾河片平陽小片的一個方言點。

5. 山東文榮型：文登、榮成位於山東半島東端，文榮方言是膠遼官話的一種。見系二等文白異讀在文榮方言的表現是：文讀為舌根音聲母，白讀為舌尖前音聲母如同精組（張衛東1984）

文榮	家	下	街	交	敲	間	夾	角	瞎
文讀	$\text{c}k\text{ia}$	xia°	$\text{c}k\text{iai}$	$\text{c}k\text{iau}$	$\text{c}k'\text{iau}$	$\text{c}k\text{ian}$	$\text{c}k\text{ia}$	$^{\circ}k\text{ia}$	$^{\circ}\text{xia}$
白讀	$\text{c}t\text{sia}$	sia°	$\text{c}t\text{sei}$	$\text{c}t\text{sia}$	$\text{c}t\text{s'iau}$	$\text{c}t\text{sian}$	$\text{c}t\text{sia}$	$^{\circ}t\text{sia}$	$^{\circ}\text{sia}$

舌尖前音和舌根音都可以出現在細音前面是這一類型的突出特點。白讀舌尖前音聲母也有出現在洪音前的情況，例如“街 $\text{c}t\text{sei}$ 、蜡 $\text{c}t\text{sei}$ 、蚧 tsei° ”，這一類字都是蟹攝二等。比較“疥 $\text{kiai}^{\circ}/\text{tsiai}^{\circ}$ 、解 $^{\circ}k\text{iai}/^{\circ}t\text{sia}^{\circ}$ ”，不難推論“街、蜡、蚧、蚧”的白讀音 tsei 可能是從三合元音變出來的： $\text{t\text{c}ia\text{ia}} \rightarrow \text{tsiai} \rightarrow \text{tsei}$ ，“解”白讀來自 $\text{tsiai} \rightarrow \text{tsia}^{\circ}$ 。

上面所列文白對應形式不只限於二等類字，見系三四等字也彷彿同出一轍：

三等——蹺 $\text{c}k'\text{iau}/\text{c}t\text{s'iau}$ ，強 $\text{kian}^{\circ}/\text{tsian}^{\circ}$ ，希 $\text{c}x\text{i}/\text{c}si$ ，季 $\text{ki}^{\circ}/\text{tsi}^{\circ}$ ，蒿 $\text{c}k'\text{iŋ}/\text{c}t\text{s'iŋ}$ ，窮 $\text{c}k'\text{iŋ}/\text{c}t\text{s'iŋ}$ 。

四等——雞 $\text{c}k\text{i}/\text{c}t\text{s}\text{i}$ ，見 $\text{kian}^{\circ}/\text{tsian}^{\circ}$ ，耕 $\text{c}k\text{iŋ}/\text{c}t\text{s}\text{iŋ}$ ，牽 $\text{c}k'\text{ian}/\text{c}t\text{s'ian}$ ，血 $\text{xie}/\text{c}si\text{e}$ ，哇 $\text{c}x\text{i}/\text{c}si$ 。

這一類型的文白異讀在漢語方言當中比較罕見。

6. 福建廈門型：閩南方言在漢語方言中最突出的特色是具有豐富、複雜的文白異讀。（袁家驊1983；hang1986）廈門方言是閩南話的代表點，它在見系二等文白異讀方面呈現著絕大的特色，與上述五種類型都不相同。底下分攝各舉若干例證，以見其一斑。

假二：家 $\text{ka}_{55}/\text{ke}_{55}$ ，價 $\text{ka}_{11}/\text{ke}_{11}$ ，蝦 $\text{ha}_{24}/\text{he}_{24}$ ，下 $\text{ha}_{33}/\text{e}_{33}$ ，芽 $\text{ga}_{24}/\text{ge}_{24}$ ，廈 $\text{ha}_{33}/\text{e}_{33}$ 。

蟹二：界 $\text{kai}_{11}/\text{kue}_{11}$ ，疥 $\text{kai}_{11}/\text{kue}_{11}$ ，解 $\text{kai}_{51}/\text{kue}_{51}$ ，鞋 $\text{hai}_{24}/\text{ue}_{24}$ ，蟹 $\text{hai}_{33}/\text{hue}_{33}$ 。

效二：膠 $\text{kau}_{55}/\text{ka}_{55}$ ，絞 $\text{kau}_{51}/\text{ka}_{51}$ ，孝 $\text{hau}_{33}/\text{ha}_{33}$ 。

咸二：甲 $\text{kap}_{32}/\text{ka}^{\circ}_{32}$ ，匣 $\text{ap}_4/\text{a}^{\circ}_4$ 。

山二：間 kan₅₅/kiŋ₅₅，揀 kan₅₁/kiŋ₅₁，眼 gan₅₁/giŋ₅₁，莧 han₃₃/hiŋ₃₃。

庚二：更 kiŋ₅₅/kĩ₅₅，硬 giŋ₃₃/ŋĩ₃₃，格 kik₃₂/keʔ₃₂，客 k'ik₃₂/k'eʔ₃₂，嚇 hik₃₂/heʔ₃₂。

這些例字具體而微展現了廈門方言文白異讀的一般狀況，當中有匣母白讀零聲母（也有舌根清塞音）和疑母有鼻音、塞音之別而外，大致說來文白聲母是相當一致的。這方面學者論列已多（黃典誠1984，張盛裕1982，張振興1982，李如龍·陳章太1982），不遑贅述。爲了便於比較，並掌握大的趨勢，我們暫時採取粗枝大葉的輪廓，把細節留到下一層次的方言分論中去處理。韻母方面的種種複雜情況更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理出一個眉目。（張琨1985，1991；chang1986，張光宇1990）總之，就分組態勢言之，廈門型文白異讀中，“見、溪”與“（曉）、匣、疑”的表現與山西諸型的分組態勢是發音方法決定的，只有從聲母系統的配置格局才能夠充分理解其道理：一般漢語方言在聲母系統上，塞音和塞擦音系列總是兩兩並立、配對整齊；如有濁音也往往是鼎足而三、秩然有序。然而在擦音、鼻音、邊音系列却呈錯落分佈，格局不大對稱。“配對整齊”限制了活動空間和變化範圍，而“錯落分佈”大有活動空間，可能的變化也多姿多樣。舉一個例，漢語方言聲母系統中“日、來”兩母的變化形形色色，就是起於它們在音系格局中“單門獨戶”的孤立狀態。

(二)

綜合上述六種類型的見系二等文白異讀，我們不難體會漢語方言發展不平衡性所產生的種種歧異以及紛亂表相底下的一些趨勢。

首先，就語音現象來說（以“見”母爲例），從福建廈門型的 k-/k-，到湖南瀏陽型的 ki-/k-，長江沿岸型的 tɕ-/k-，山東文榮型的 ki-/ts-，山西萬榮型的 tɕ-/ts-，山西汾西型的 tɕ-/t-，既各呈異彩又似乎秩然有序。爲了便於點明問題所在，我們把歷史發展過程中立體、動態的畫面攤在一個平面、靜態的格局上加以透視。下表就是模擬的語音發展過程簡化格局：

古“見”母	k-	ki-	tɕ-	ts-	ts-	t-
長江沿岸型	白		文			

(洞口、漣水)	白		文(洞口)	文(漣水)
湖南瀏陽型	白	文		
山西萬榮型			文	白
山西汾西型			文	白
山東文榮型		文		白
福建廈門型	白/文			

這個簡化格局說明：(1)見系二等文白異讀在漢語方言有華南、華北分野的傾向。華南包括長江沿岸及其以南（東南半壁）地區，白讀都是洪音（用 K-標示），文讀則除了福建廈門型大體為洪音之外，其餘華南方言均為細音（湖南瀏陽為 Ki-；洞口、漣水的 ts-、ts-係從早期的舌面音 tɕ-演變而來）。假使我們取梗攝三四等的韻母合而並觀（chang1987，李榮1989），華南、華北分野的傾向更加明朗：粗枝大葉地說，華南具有較低的元音（-ia-，變體或作-io-），華北具有較高的元音（-iE-,-ie-,-i-）。細說起來，上列見系二等文白異讀可以大體三分：南方的廈門最為保守，長江沿岸次之，華北三型變化最為劇烈。(2)從保守（conservative）和創新（innovative）的觀點看，長江沿岸型的白讀比文讀保守，華北諸型（山西萬榮、汾西，山東文榮）恰好相反，文讀反比白讀更為保守。這個現象大體反映華北中原邊緣及外圍地區方言在發展速度上比“標準語”還要快：從“標準語”借貸而入的文讀還處於“顎化”（ki-/tɕ-）階段時，其自身方言的固有成分却早已從“顎化”更進一步變出種種形貌：華北三型中的白讀（ts-,ts-,t-）都是舌面音（tɕ-）的後續變體。其發展過程可用下列程式表示：

$$k \rightarrow ki \rightarrow tɕ \rightarrow \begin{cases} ts- \\ t- \end{cases}$$

這個程式說明：華北三型文白讀歷經相同類型的變化過程，唯一的差別在於“階段”——白讀變化速度快，已經走完了“全程”，而文讀仍停留在較早一個階段。白讀走過的路後來為文讀所沿襲，這在漢語方言並不罕見。舉個例，山西吉縣方言“吹”字白讀為_cpf'u，文讀為_cpf'ei，文讀未進來以前，白讀早已由 ts'-變為 pf'-（連同韻母變化），文讀傳入之初，原先可能是 ts'uei，其後趕上步調再變為_cpf'ei。不同方言的音系變化可能沿襲同一路徑，但有遲速不等，這在華北方言應

該視為一項數見不鮮的規律。確認這個原則有助於廓清華北方言的紛亂景象。(3) 上列格局明顯地反映著一個傾向，白讀分屬兩邊，文讀集結在中央。假使我們把洞口和漣水的文讀左移至其所從出的舌面音部位，那麼畫面上文白劃然分居的態勢就更耀眼了。這樣的一個畫面表明，漢語方言見系二等的文讀是在“標準語”大體聲母已經顎化 (ki-,tɕ-) 的階段才施展其影響力的，而白讀的歧異充分說明在文讀勢力擴散以前漢語方言已呈現南北的巨大差別。白讀代表漢語方言離心、分化的 (centrifugal) 一面，文讀則代表漢語方言向心、統一的 (centripetal) 一面。(張光宇1991) 有趣的是，文讀在紛然雜陳的華北、華南方言中表現其“中庸之道”，既不過於保守，也不偏於創新，執兩用中，誠然具有統合的力道，亦可謂天造地設。應該指出，華北也有保守的一面，未必全然創新，比如山西若干方言梗攝二等猶存較低的-a類元音；華南也有創新的一面，未必全然保守，比如福建廈門山攝二四等舒聲部份歷經變化而產生-ig。(張光宇1989 a)

華北三型分佈的地理位置處於中原邊緣或外圍，而不在中原核心地帶。這種分佈情況反映見系二等文讀原是中原核心方言的產品，由此向四鄰擴散及於大半個中國，有的方言甚至被大量取代，只留下些許早期方言的痕跡。比如河北灤南縣城東北有兩個叫“冉各莊”的村莊，原來叫做“冉家莊”，只因“家”字輕讀 (Ka → Kə·) 了才改寫為“各”。(王輔世1989) 類似的情形還有“張家莊、胥家莊”之類“家”字讀 [·Kə]。(丁聲樹·李榮1984) 北京處於中原外圍，明顯曾受這一文讀浪潮的襲擊。北京方言裡，“德、職 (莊組)、陌、麥”四韻白讀為複元音 (-ai,-ei)，文讀為單元音 (-e~o,-i)，“鐸、藥、覺”三韻凡唸-ao-iao 為白讀，凡唸-ɔ~uɔ,-üe 為文讀。白讀為古河北方言所固有，文讀係來自中原官話。比較河北保定區滿城話的文白異讀 (陳淑靜1984)，即可思過半矣。比較大官話地區更可明白北京的文讀實來自古中原官話。以“藥、覺”為例，一般西南官話為-io，四川方言為-yo，河南遂平為-yo (丁聲樹1989)，北京文讀的-üe 正是-yo 的後續發展。從明成祖13年 (1415) 遷都以來，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音系逐漸躍昇取得了引領風騷的地位，它所得自中原官話的文讀很快普及於知識階層，隨著政治、文教力量的推廣更進而逐漸向外擴大其勢力圈。不少漢語方言的文讀和北京文讀酷似，有的甚至可以明確指認來自北京，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有人以為北京的文讀是固有的，白讀是外來的，也許是一項疏忽。其實，北

京的文讀一如其他方言的文讀，係由外傳進來的，白讀才是本地的。拉長時間深度，擴大比較面積，可以說白讀是較早由方言人民使用在各地自然流變定型下來的，文讀則是由於文教的需要由標準語在較晚時期傳入方言中扎根的。文讀在北京扎根以後對外發生影響肯定是比較晚近的發展。

見系二等的文讀勢力雖然已在長江沿岸大埠扎下了根，但是並沒有深入到東南半壁各省全境。以浙江吳語區來說，浙北雖受影響，浙南則大體未受影響。茲舉假攝二等“家”字和蟹攝二等“街”字為例：（傅國通等1985）

(1) “家”字：在浙江省下列二十點當中只有白讀而無文讀。（杭州、浦江、只見文讀形式，溫嶺空白待補）

臨海	c ₁ ko	平陽	c ₁ ko	縉雲	c ₁ kU	永嘉	c ₁ kuo
天台	c ₁ ko	文成	c ₁ ko	青田	c ₁ kU	永康	c ₁ kuA
樂清	c ₁ ko	宣平	c ₁ ko	龍泉	c ₁ ko	武義	c ₁ kua
溫州	c ₁ ko	雲和	c ₁ ko	慶元	c ₁ ko	麗水	c ₁ kuo
瑞安	c ₁ ko	景寧	c ₁ ko	泰順	c ₁ ko	松鶴	c ₁ kuΛ

具有文白兩讀的共佔四十六點。其中讀_ctsia（文）c₁ka（白）的計有嘉興、平湖、海鹽、海寧、湖州、長興、安吉、孝豐、德清、余杭、臨安、衢州、常山等十三點；讀_ct ia/c₁ko的計有富陽、紹興、諸暨、蕭山、嵊縣、新昌、余姚、鎮海、象山、定海、寧海、黃岩等十三點。其餘二十點的情況是：嘉善_ctsia/c₁ka，桐鄉_ctsia/c₁ka，昌化_ctsia/c₁ku，桐廬、分水_ctsia/c₁kuo，上虞_ctsio/c₁ko，寧波_ctsyo._cko，奉化_ctsia/c₁k，仙居_ctsio/c₁ko，金華_ctsia/c₁ku，蘭溪_ctsia/c₁kua，湯溪_ctsia/c₁kua，義烏_ctsia/c₁ko，遂昌_ctsio/c₁ko，龍游_ctsia/c₁kua，開化_ctsyo/c₁ka，江山_ctsia/c₁ka，建德_ctsia/c₁k，壽昌_ctsia/c₁kuΛ，淳安_ctsia/c₁ko。

(2) “街”字：在浙江省下列二十八點當中只有白讀而無文讀。（杭州、武義只有文讀而無白讀，溫嶺空白待補）

上虞	c ₁ ka	寧海	c ₁ ka	瑞安	c ₁ ka	宣平	c ₁ ka
諸暨	c ₁ ka	天台	c ₁ ka	平陽	c ₁ ka	雲和	c ₁ ko
蕭山	c ₁ ka	仙居	c ₁ ka	文成	c ₁ ko	景寧	c ₁ ko
余姚	c ₁ ka	黃岩	c ₁ ka	永康	c ₁ ciA	青田	c ₁ ka
寧波	c ₁ ka	樂清	c ₁ ke	麗水	c ₁ koD	龍泉	c ₁ ka

奉化	<i>ckA</i>	永嘉	<i>cka</i>	縉雲	<i>cka</i>	慶元	<i>cka</i>
臨海	<i>cka</i>	溫州	<i>cka</i>	松陽	<i>cka</i>	泰順	<i>cka</i>

具有文白異讀的共佔三十八點。其中有十八點的文白形式是 $ct\ ia/cka$ ，這一類方言包括嘉興、平湖、海鹽、湖州、長興、安吉、孝豐、德清、余杭、臨安、昌化、紹興、新昌、象山、定海、湯溪、浦江、遂昌；其餘二十點的對應情況是：嘉善 $ctsia/cka$ 、桐鄉 $ctsia/cKA$ 、海寧 $ctsiA/cka$ 、富陽、桐廬 $ctsiε/cka$ 、分水 $ctsiε/ckε$ 、嵊縣 $ctsia/cka$ 、鎮海 $ctsiε/cka$ 、金華 $ctsiæ/cka$ 、蘭溪 $ctsiæ/cka$ 、東陽、義烏 $ctsi ai/cka$ 、衢州、開化 $ctsiε/ckε$ 、龍游 $ctsiε/cka$ 、常山 $ctsia/ckε$ 、江山 $ctsi/ckai$ 、建德 $ctsiε/cka$ 、壽昌 $ctsiæ/ckp$ 、淳安 $ctsi/ckp$ 。

“家”字只有白讀的二十點當中除了武義方言之外，其餘十九點重見於只有白讀的“街”字二十八點方言。這些方言大量集結於浙南。這種地理分佈情況說明：文讀勢力來自北方，並逐漸往南侵奪，慢慢擴大影響範圍。

福建廈門型見系二等文讀和長江沿岸型的白讀相當，這種現象在漢語方言發展史上到底代表何種意義？從歷史來由上說，文讀原初隨讀書音的推廣進入方言音系，但是行用日久，讀書音伴隨書面語逐漸滲透到日常口語，終於在口語中扎了根，進行方言自身的音系變化或結構調整。等到後起的文讀（在北方陸續發展的結果）再度傳進來的時候，早先方言的文讀早已成爲白讀。事實表明，文讀在歷史上是以“前仆後繼”的方式一波接著一波從帝國的行政中樞向四面八方輻射出去的。這個中心隨朝代的更迭而變遷，大抵不出“長安——洛陽——北京”幾個歷史名都。這些帝國首府位在北方，長江沿岸所受歷代北方的影響在年代次序上既先於處於東南邊陲的福建，在程度上更遠非後者所能望其項背。不用說，這是地理鄰接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決定的。就見系二等來說，今天長江沿岸型的白讀和福建廈門型的文讀原來承襲的是大體相同的北方標準語音系，其時期大約在唐宋年間。今天一歸白讀、一歸文讀的原因，可能得從文教勢力在兩方的消長情況去探索。長江沿岸的文教勢力之大（包括受教人口數量和分佈面積）在近代以前可能是福建望塵莫及的。（就文教勢力而言，我們不以爲“進士及第”數有太大的意義，而應著眼於全境、全民的文教普及程度）。原初以“文讀”身份進入長江沿岸的，後來融入口語，到了元明年間新的文讀系統傳進來，舊的讀書音轉成白讀。福建廈門的情況不同，唐宋時期的文讀音系始終傳授於“書院、梨

園”而不普及於庶民大眾，讀書音一向為少數知識階層所擁有，至今仍舊還是讀書音。又由於遠離帝國中心，對新起的文讀比較暗昧，私塾、書院或梨園先生代代相傳、墨守成規也難免形成守舊集團。長江沿岸型的白讀相當於福建廈門型的文讀在漢語方言間並非孤立的現象。以“蟹攝四等”為例，山西平遙方言（侯精一1989）文讀為-i，白讀為-ei：“西 $\text{ei}_{13}/\text{sei}_{13}$ ，洗 $\text{ei}_{53}/\text{sei}_{53}$ ，細 $\text{ei}_{35}/\text{sei}_{35}$ ，劑 $\text{tsei}_{35}/\text{tsei}_{35}$ ，妻 $\text{tsei}_{13}/\text{ts'ei}_{13}$ ”。白讀韻母與日語漢音、廈門文讀（-e）相當，正是隋唐時期長安、洛陽翻譯佛經中最常見的蟹攝四等的代表性韻母。山西平遙蟹攝四等的文讀與北京音相當。再看日語吳音和廈門同類字的白讀-ai（例如“西”字同為sai），就清楚地浮現一個生動有趣的歷史發展軌跡，把原本表面錯綜紛亂的現象連結成井然有序的關係脈絡：

-i——北京音、平遙文讀

-ei——隋唐音、平遙白讀、廈門文讀、日語漢音

-ai——（蟹攝四等早期韻母）、廈門白讀、日語吳音

就是在這種既有歷史文獻可以查證，又有域外對音可以比對的情況下，我們推斷廈門文讀起自唐宋時期（張光宇1985，1989b）。長江沿岸見系二等的白讀和山西平遙蟹攝四等的白讀原初也是唐宋時期的文讀音。長江沿岸和山西平遙今日所見文讀顯係較晚一個時期才從標準語再度傳進來的。

山東文榮方言蟹攝二等見系字普遍具有三合元音，例如“街 ckiai 、疥 kiai^2 、秸 ckiai 、解 ckiai 、蚧 kiai^2 ”。這類字的白讀形式 $\text{tsei}, \text{tsi}\epsilon$ ，前文曾根據“疥”字白讀 tsiai 推論原來也都是三合元音。江蘇漣水方言“階皆 $\text{ts}\epsilon_{31}$ ，解 $\text{ts}\epsilon_{212}$ 界介屆戒 $\text{ts}\epsilon_{55}$ ”的較早來源也可能是一個三合元音。東南半壁方言中這類元音比較少見，最突出的是梅縣客家話，例如“皆階 ckiai ，介界疥芥戒 kiai^2 ，解 ckiai ”。其他具有這類三合元音（-iai~iɛi）的分佈情況大體如下所列：

遼寧省：長海

山東省：莒南，莒縣、黃縣、（文登、榮城）

山西省：文水、洪洞、太谷、祁縣、永濟、臨汾

河北省：海興、鹽山、孟村、滄州、南皮、交河、東光、阜城、景縣、吳橋、故城、清河、廣宗、威縣、臨西、館陶

河南省：睢縣、襄城、鄭州、宜陽、欒川、偃師、臨汝、新安、澗池、洛寧、陝

縣、靈寶、盧氏、汝陽、南陽、西峽、浙川、內鄉、南召、方城、鎮平、
鄧縣、新野、唐河、社旗、遂平

安徽省：安慶、岳西

江蘇省：南京、靖江（老岸話）

湖北省：沔陽、漢川、天門、棗陽、隨縣、安陸、雲夢、蒲圻、監利

湖南省：資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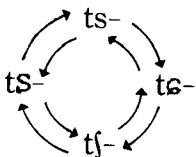
浙江省：義烏、東陽、金華

雲南省：平彝、永平、鶴慶、保山

四川省：成都、華陽、安岳、大足、永川、潼南、蓬溪、岳池、武勝、江北、巴
縣、南川、培陵、長壽、鄰水、大竹、酆都、酉陽、秀山、忠縣、梁山、
開縣、城口、通江、宣漢、達縣、南江、廣元、昭化、劍閣、梓潼、蘇
陽、安縣、綿竹、廣漢、金堂、名山、懋功、射洪、鹽亭、什邡、新繁、
理番、崇慶、溫江、彭山、大邑、丹陵、眉山、高縣、古藺、合江、江
津、綦江、仁壽、榮縣、隆昌、榮昌、儀隴、蓬安、三台、遂寧、羅江、
德陽、中江、樂至、萬縣、石碭、黔江、雲陽、奉節、巫山

這些方言點材料來源不止一端，恕不一一注明出處。雖然掛一漏萬，勢所難免，但是大體的傾向還是明朗的：漢語方言蟹攝二等的文白讀兩階段上都有三合元音（kiai、tɕiai），它們在北方的遞變隨方言而異。這種三合元音原先可能是中原核心地帶的產品，現代的地理分佈是其逐漸擴散的結果。

從演變的軌跡看，華北三型見系二等的白讀都是舌面音的後續變體，也就是說，見系聲母首先經過顎化階段，再轉讀為舌尖後音、或舌尖前音，舌尖塞音。就音理而言，這樣解釋毫無滯礙之處。事實上，從漢語方言比較中不難確認：ts-, tɕ-, tʃ-, tʂ-等塞擦音系列構成循環演變圈，（如下圖所示）不管順時針方向還是逆時針方向看去，都有助於索解漢語方言的種種形貌（雖然各音之間不一定是直接演變的關係）。見系聲母的變化在細音前首先變為舌面化，由舌面聲母和-i-介音的互



動才衍生出其他聲母。表面上看起來，山東文榮方言見系字的白讀舌尖前音 (ts-) 似乎不是“顎化說”所能解釋(張衛東1984: 47—48)，如此則山西汾西白讀中的舌尖塞音 (t-)，山西萬榮白讀中的舌尖後音 (ts-) 也將束手無策。事實上擴大比較範圍之後，我們發現，除了“顎化說”再無更好的解釋。在探討語音現象上，找出表相底下的動力因素才是關鍵所在。由於發音部位的差異，古端組聲母字讀同精組的現象時或不能與見組讀同精組的現象混為一談，這是有必要附帶說明的。關於山西萬榮見系二等的白讀舌尖後音聲母的發展，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它與早期的舌尖後音聲母的變化形成一個鏈環，簡化寫來就是：tɕ → ts → pf。這個程式說的是，早期的舌尖後音變唇齒音，早期的舌面音變舌尖後音。

就一般大勢說，漢語語音史上見系聲母曾經發生過兩度“顎化”。首度顎化促使上古舌根聲母變為中古時期的章組(照三)，第二度顎化就是中古時期見系聲母演化成現代方言的舌面音。首度顎化覆蓋了中國全境，例外只殘留於閩方言(例如廈門“痣 ki²、齒^ck'i、指^cki、枝^cki”)。第二度顎化所覆蓋的面積遠不及首度顎化，大略只達官話分佈區域及毗鄰的其他方言，東南半壁大體未受波及。漢語語音發展史上的這兩度顎化大體遵循著相同的軌道。然而細說起來，第二度顎化在地理上或音類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如本文開頭所舉蘇州方言止攝合口三等見系字白讀顯示的“顎化”現象(“龜”^ctɕy)那樣，浙江吳語全境絕大多數也讀舌面音(傅國通等1985: 43—44)；長江沿岸(尤其是南岸)，流攝一等見系字常出現“顎化”，有的方言甚至於變舌面化，例如“狗”字在江西南昌為 kieu₂₁₃，高安為 kieu₄₂，湖南婁底方言讀 tɕi₄₂；浙江臨安^ckiə，富陽^cki 上虞^ckiɿ，肖山^cki，余姚^cki，寧海^ckiu，黃岩讀^ctɕio。這兩類現象也出現在安徽南部，例如休寧“鬼 tɕ_{y31}，貴 tɕ_{y55}，跪 tɕ_{y31}”，岳西“狗 kieu₂₄”。山攝一等見系字在浙江也不乏讀舌面音的例子，如溫嶺“乾~淨 tɕi e₃₃”。就大官話區(包括晉語)四等具全的韻類說，見系字聲母的“顎化”或舌面化實際上也有階段的差別：其變化大體先發生於三四等其次才發生於二等。就像首度顎化的例外殘餘形式出現在福建地區一樣，這第二度顎化的大潮流在山西方言也有例外情況，例如“起”字在新絳讀 k'i₄₄，萬榮讀 k'ei₅₅，“去”字臨縣讀 k'ə₂₄，原平讀 k'ə₄。即使在北京方言裡二等韻字的顎化也不是全面性的，例如“蟹二”和“江二”的“楷”和“港”字所示。漢語語音史研究上清代學者江永關於等第的洪細學說大約是在大官話區中類似的音變

已經定型的音系基礎上提煉化約而得的結論，李榮(1983)認為江永的學說係以十八世紀初期的北京音系為基礎，應與事實相去不遠。

見系二等聲母的顎化以-i-介音的產生為前提。這是近代漢語語音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產生背景主要和韻母系統的變動有關，以致於在聲母和韻母的結合上起了變化。這個新起的介音大約是宋末元初已經明顯出現在官話區的優勢方言，因而得到以反映實際著稱的《中原音韻》作者的注意。《中原音韻》把“江”字與三等“姜”字並列，把“庚、更、羹、耕”與三等“京、驚、荆、兢”及四等“徑、涇”等字混列。此外，《蒙古字韻》對音材料也多少反映了這一語音事實。(李新魁1984: 473) 周德清(1277—1365)生當十三、四世紀，距今約六、七百年，這個時間深度比過去一般所說見系聲母的顎化不應早於十六世紀還早兩三百年。其實，不管是十三、四世紀說還是十六世紀說都不免受韻書束縛。第一，如前所說，見系聲母的顎化在漢語語音史上是個賡續不絕的過程(*incessant process*)，首度顎化發生以後，第二度顎化接力式地發生。《中原音韻》和《蒙古字韻》充其量只不過反映了近代漢語語音史的局部現象。通史觀之，如受這兩個文獻材料所限，眼光將不免受到矇蔽。第二，從華北方言看，白讀早已走過的顎化階段後來方為文讀音系所沿襲。韻書文獻所登錄的現象如以優勢標準語為對象，那麼其時代斷限必是保守估計。語音變化程式中一兩步差異可能代表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代跨度(*time span*)。第三，從華南方言看，吳語區內見系聲母的顎化與官話分庭抗禮，表現著頗具獨立色彩的內部規律。像止攝合口三等和若干一等韻見系聲母的顎化非僅與官話大異其趣，而且事實表明，這一類的顎化在文讀傳來以前早已定型化且深根柢固廣泛存在過。以止攝合口三等見系聲母的顎化來說，假使援引清康熙(1662—1722)《嘉定縣志》所說“歸、龜呼為居”定為其起始年代，至今不過三百年。這是不免迂腐之譏的。總而言之，漢語語音史研究上的時代斷限往往因為受文獻材料的束縛而做出保守甚至荒謬的估算，漢語方言文白異讀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漢語語音史的透視，傳統上以一隅文獻為據來給漢語語音史刻上時代標幟的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有必要修正的。

※後記：本文原為提交中國音韻學會第七次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山東省威海市，1992年8月26日~28日)的宣讀論文。到會之後，大會改邀筆者做專題演講(1992.8.28下午)。筆者在這裡要特別向大會諸君、邵榮芬先生、

唐作藩教授、陳振寰教授、尉遲治平教授致以謝意。1992.9.15作者。

參考書目

- 北京大學1989《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蔡權1990《吉縣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儲誠志1987安徽岳西方言的同音字彙,《方言》284—293。
- 丁聲樹1989河南省遂平方言記略,《方言》81—90丁聲樹·李榮1984《漢語音韻講義》,上海教育出版社。
- 傅國通等1985《浙江吳語分區》,浙江省語言學會。
- 侯精一1989平遙方言的文白異讀,《晉語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125—134。
- 胡士云1989漣水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31—143。
- 黃典誠等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三聯書店。香港。
- 黃典誠1984閩語的特徵,《方言》161—164。
- 李濟源等1987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彙,《方言》294—305。
- 李如龍·陳章太1982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1:25—81
- 李榮1970溫嶺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1—19。
- 李榮1983關於方言研究的幾點意見,《方言》1—15。
- 李榮1989南昌溫嶺婁底三處梗攝字的韻母,《中國語文》416—424。
- 李新魁1984近代漢語介音的發展,《音韻學研究》1:471—484。
- 潘耀武1989清徐(清源)話的文白異讀,《山西方言研究》101—111。
- 喬全生1990《汾西方言志》,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唐作藩1960湖南洞口縣黃橋鎮方言,《語言學論叢》4:83—133。
- 王輔世1989灤南話雜談,《中國語文》461—467。
- 吳建生1984《萬榮方言志》,語文研究增刊(1)。
- 夏劍欽1983瀏陽南鄉方言記略,《方言》47—58。
- 熊正輝1985南昌方言的文白讀,《方言》205—213。
- 熊正輝1989南昌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82—195。
- 徐通鏞1991《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北京。
- 顏森1982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詞彙,《方言》66—80,156—160,224—240。
- 葉祥苓1988蘇州方言中的文白異讀,《吳語論叢》18—26。
- 袁家驊1983《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琨1985論比較閩方言,《語言研究》8:107—138。
- 張琨1991再論比較閩方言,《語言研究》20:93—117。
- 張盛裕1982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方言》52—65,129—145,196—202。
- 張衛東1984文登、榮成方言中古見系部分字的文白異讀,《語言學論叢》12:36—49。
- 張振興1982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彙,《方言》203—228。
- 張光宇1985《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9:26—37。
- 張光宇1989a 閩南方言的特殊韻母-ij,《大陸雜誌》第79卷第二期64—70。
- 張光宇1989b 閩方言音韻層次的時代與地域,《清華學報》新19卷第1期95—113。
- 張光宇1990《切韻與方言》,台灣商務印書館。431—438。
- Chang,Kuang-yu 1986 《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 Chang,Kuang-yu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g-Rhyme group in Southern Chinese,《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28:43-52.

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Palataliz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2nd Division Velar Initial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Chang Kuang-y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lloquial/literary distinction in the velar initials of the Middle Chinese 2nd division rhyme categories is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phenomena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phenomen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types: (1) Yangtze River type: C. k- and L.t ϕ . This kind of distinction is found in large cities along the River such as Suzhou, Yangzhou, Wuhan and Changsha. (2) Liuyang in Hunan province: C.k- and L. ki-. (3) Wanrong in Shanxi province: C. ts- and L.t ϕ -. (4) Fenxi in Shanxi province: C. t- and L. t ϕ -. (5) Wenrong in Shandong province: C. ts- and L. ki-. (6) Xiamen in Fujian province: both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k-. These six types reflect the discrepant development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in miniature;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r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e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north, there seems to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re of the central plain and its periphery. In the south, there seems to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which are near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ose which are far from the River. The core of the central plain serves as the epicenter of the palatalization in question, While the wave-like spread has reached most Chinese dialects and indeed replaced their old readings in large scale, the southern Chinese remain resistant to such change—Min, Hakka, Yue and southern Wu dialects have not been affected by such northern intrusions. Palatalization is an incessant proces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and it is not easy to date this phonetic event.